

柏林精英会

李林博：中国工商银行法兰克福分行副总经理；常鸿宾：德恒律师事务所驻德首席律师；郑立樵：中国驻德国使馆参赞；张超：柏林旅行社总经理。这四位看似彼此毫不相关的中国人有两个共同之处：都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又都是北大德国校友会的成员。

该校友会成立刚刚一年，成员便发展到120多名。6月21日，近一半的校友不远“百”里来到柏林自由大学孔子学院，与也是在一年前走马上任的北大校长王恩哥团聚。这是他首次以校长身份访问欧洲，日程包括英、德、法八所国际知名的大学。在德国，王恩哥与柏林洪堡大学和自由大学签署了密切校际合作的协议。

北大与德国的关系源远流长，几位校长都曾在德国留学。蔡元培便是其中之一。王恩哥承继了这一传统。2006年，他得到洪堡研究奖，是获得这一荣誉的第二位中国学者。他可任选研究机构，在德国逗留一年。王恩哥抽不出整段的时间，洪堡基金会于是表现出德国人少有的灵活性，允许他将一年分成三个夏天，在柏林自由大学的一个下设机构潜心研究。因此，王校长在对北大德国校友发表的演讲中自称是柏林自由大学的校友。

在场一位德国女性的情况则正相反。她是柏林自由大学汉学系教授，却对北京大学一往情深，称之为自己的第二学术故乡。她有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字：罗梅君。1974年，罗梅君就读北大历史系，是德国人赴中国留学的开先河者。从那以后，她定期前往北大，只是身份不断变化，从交换学生、交换学者到客座教授。在她看来，北大德国校友会可在推动北大和德国大学的合作方面扮演积极的角色，因为学术的未来在于合作。罗梅君说：德中政府间的密切关系也使两国的学术交流如虎添翼。这一交流已远不止德国汉学系学生去中国留学和中国日尔曼语言文学系的学者来德国进修，德

中学术界的合作已进入跨越学科和国界的阶段。具体来说就是：两国学者共同研究一个项目，并在对方的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

在鹰龙德华咨询公司总经理景岱灵看来，中德两国学生交流的程度之深、涉及领域之广应当归功于30多年前德国的远见。景岱灵是文革后北大首批研究生之一，并留校任教多年。他说：“上世纪80年代，在所有发达国家当中，德国在学术方面给与中国最多。”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董琦对此完全赞同。他在演讲中说：“当时自费留学的不多，而公派留学的博士生中，来德国的最多。”这与德国的政治基金会直接相关。景岱灵以巴伐利亚的汉斯-

赛德尔基金会为例。80年代，该基金会资助柏林自由大学和北大之间的学者交流，中国学者来德和德国学者赴中国的费用都由基金会包了。景岱灵忘不了已故负责国际关系的哈特曼先生对当时北大党委书记王学珍发出的一番肺腑之言：“我们现在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能力；也许有一天我们没这个能力了，希望你们来帮助我们。”景岱灵感慨地说：“今天我们北大学子济济一堂与德国对中国的支持分不开。”

在北大德国校友会和北大代表团的见面会上，直呼其名的少，听到更多的是“学姐”、“学弟”这样亲切的称呼。用董琦公使的话说：“北大的感召力巨大。北大一声呼唤，是北大、不是北大的都聚集到了一起。”在场的确实有同济校友会、复旦校友会等其他校友组织的代表。这些校友会都先于北大校友会成立。为什么北大校友略显迟钝呢？校友会副会长、欧洲飞扬集团德国意博展览公司总经理李政军说，做什么事情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他在2010年就有了成立北大校友会的念头，但因公司的业务发展和人事变动而搁置下来。

2013年3月25日，九名北大学子聚集法兰克福杨晓冰博士所在的律师事务所，通过章程，宣布北大德国校友会正式成立，并推举杨晓冰作会长。也

是北大校友的中国驻德大使夫人徐静华担任名誉会长。在德国成立协会需要开账户。李政军说：“我们打听了好几家德国银行，都不给我们开，因为我们还没正式注册。后来去中国银行找了我们的校友，马上办成了，而且是免费。”

中国银行驻德机构里，有好几位是北大毕业生。他们当中却几乎没有金融专业出身的。北大校长王恩哥在演讲中也提到了北大毕业生改行的高比例。他以自己所学专业的物理系为例：其他大学物理系毕业生改行的占20%，而北大却只有20%的学生毕业后从事自己的专业。王校长认为，这正是北大独一无二的表现。在北大延续一百多年的兼容并包的学术气氛下，学生学到的是人生的基础。王校长说：“如果想在毕业后干什么都行，那就到北大来读书。”文中提到的这些北大校友不是最好的证明吗？

(2014.6.22, 张丹红)